

中美流动迁移 比较研究

郑真真 贺珍怡 张展新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美流动迁移 比较研究

郑真真 贺珍怡 张展新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流动迁移比较研究/郑真真，贺珍怡，张展新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0
ISBN 978－7－5161－7657－3

I. ①中… II. ①郑… ②贺… ③张… III. ① 人口迁移—对比研究—中国、美国 IV. ①C922. 2 ②C922.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747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75
插 页 2
字 数 284 千字
定 价 6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2011 年末至 2014 年春，围绕着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这个主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开展了一项合作研究。在该合作研究项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具体承担了中方学术协调和组织工作。项目执行期间，中美两国学者进行了密切的交流，在美国、英国和中国多次召开研讨会。这一合作项目以独到的视角和新颖的方式，为中美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全球化、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和美国人口流动迁移的主要特征、问题和挑战。本论文集收录了这项合作研究的主要成果。

— 比较的视角

“中美流动迁移比较研究”这一书名简明地展示了本论文集的主题。中国和美国都是人口大国，但两国的人口迁移有很大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口迁移形成举世瞩目的大潮，主流是不改变户籍身份的跨城乡、跨地区人口流动；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流动人口，较少涉及户籍迁移人口。在美国，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并存，但政治与社会关注和学术研究的重点是数量庞大、成分复杂的外来国际移民。中国的国内人口迁移和美国的国际移民迁入，二者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吗？通常而言，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属于不同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讨领域，这是基于这两种人口迁移的明显区别。但是，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也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在中美两国本身共性或可比性的背景下，可以得到更大的彰显，并引申出新的一般性议题。这是本项目比较研究的出发点。

中美两国都是人口众多的大陆国家，都存在着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差异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个相似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比较研究的一些共同关注。在中国，巨大的区域差异派生了人口流动的流出地和流入地，但流入地的空间分布更加广阔，比较集中在改革开放的一线城市，因此也更为引人注目；流入地区和城市的外来人口数量差别很大，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都市是外来人口聚集的典型。与中国的国内迁移不同，美国人口迁移以全球的国家 and 地区间差异为前提，美国整体上是一个国际迁移的流入地。但是，由于“拉力”的不同，外来移民不是均匀地分布在美国各地，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城市通常面临更大的移民压力。这样，基于区域差距这个相同的事实，“流入（接收）地差异”成为中美比较研究的基础。据此，社会权利和政府治理的理念在不同题目下展开，成为本论文集的两条研究主线。中国和美国的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不同层次、不同处境的地方政府，都面临着外来移民治理的政策课题，但是侧重点和治理方式可能不同。地区多样性条件下的移民治理，主要挑战是如何向外来移民提供基本的社会权利和充足的社会保护，又照顾到当地社会民众的利益。这种挑战主要涉及中下层移民。因此，虽然迁移人口构成多样，其中包括高科技人才，但在本书中，中美学者注重相似层次迁移者（中国农民工和墨西哥裔等拉美移民）的研究和比较。

二 综合性研究、理论导向研究和专题研究

本论文集共收入了 12 篇论文，包含了综述性研究、理论导向研究和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专题研究这三大研究内容。《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综述》介绍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对各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流动状况做了定性和定量的描述，兼顾讨论了不同时期公共政策的特点。这是关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总体性回顾与展望。《共同的挑战：中美人口转变、社会分层与移民子女教育》依然属于综述性研究，主要特点是比较、聚焦和概

括：第一，采用了美国和中国比较的视角；第二，主要观察对象不是迁移或流动人口，而是他们的子女；第三，通过文献综述，总结了美中两国在各自的教育体制下，移民子女的社会流动机会和问题。这也是人口迁移流动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随后的三篇论文具有理论导向研究的特点。《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包容与农民工权利均等化》讨论了中国农民工的权利地位变化。该文认为，1997年以后，中国从单一的市场化发展走向市场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双重转型，并考察这一转型对农民工的正向影响——在公民资格基础上的权利均等化。《中国地方治理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公民权实现问题》同样以农民工权利为主题，也注意到国家开始明确农民工的公民权利。但是，作者指出，中央政府的公民权建设受制于地方治理，并在“地方治理类型”的框架下，考察了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四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公民权实现程度差异。这两篇中国学者的论文都关注流动人口的公民权利，但前者论述全局性制度变迁及其总体后果，后者聚焦地方层面的差异，两项研究形成互补。《比较社会权利：美国的身份与融合》是美国学者的研究。作者定义了社会权利和社会、政治融合，从相关文献中引出“接纳环境”的社会融合模型和多要素的政治融合模型；在此基础上，从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个层面，考察移民身份的政策和影响整合的政策，指出各级政府政策模糊、差异甚至矛盾影响移民的融合。

另外六篇论文都是有关人口迁移的专题研究，涉及移民的健康、教育和养老保障。《美国外来移民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医疗保障》关注两国的迁移人口，但实证分析集中在美国的移民群体。在论文中，两位美国学者描述了向移民提供医疗服务和保障的政策演变，以及移民获取医疗资源方面的挑战和困难；发现墨西哥移民与中国乡城流动人口都遭遇到健康服务不足的问题；总结了美国经验对中国流动人口健康的借鉴意义。《流动人口的健康：现状与政策启示》对中国两大流动人口聚集城市——深圳和北京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和医疗服务利用的差距进行了统计分析，讨论了造成两城市差距的可能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论证了不同的地方安排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再学习

的安全空间：移民学生从高中到社区大学的过渡》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的拉美裔移民，主题是这类少数族裔迁移群体通过选择社区大学，在高中和大学教育获得上取得一定的成功。《相同的政策，不同的实践——北京、上海和广州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1996—2013）》对三大都市落实中央政府流动儿童教育政策的情况进行了考察、比较，提出“调控为主”“公办学校为主”和“市场为主”三种不同的城市模式。《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历史路径与前景展望》讨论了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背景、从地方到中央发展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分割和低覆盖、低水平等问题，并对农民工参保的前景做了展望。《美国养老保障探索：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对美国社会养老保障问世之前的养老制度安排进行了历史性回顾，是对移民养老保障研究的一个补充。

三 社会权利与政府治理：两条研究主线

各篇论文是不同作者的独立研究，论题和方法各异，但是，这些研究贯穿着两条相互交织的主线，形成全书内容的有机联系。一是社会权利。这既是考察、评估中美两国移民政策的工具性概念，也体现了研究者共有的价值取向。二是政府治理。移民在流入地或接收地能否获取与当地公民平等的社会权利，法定的权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到实践层面，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分权治理和移民政策。

全书的多数研究都直接或间接涉及迁移人口的社会权利问题。在理论导向研究论文中，社会权利概念得到较多的阐述和运用。《比较社会权利：美国的身份与融合》一文把社会权利界定为移民“在选择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和公民融合方面的基于政府权力的保障”。这不算是完整的学术定义，但适用于本书的研究。《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包容与农民工权利均等化》按照是否就业关联划分了社会权利，进而论述了中国农民工社会权利方面的进展与不足。《中国地方治理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公民权实现问题》使用“公民权”概念，但主要考察社会福利权益，如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实际上关注社会权利——与福利国

家相关的公民权利。其他论文与具体的社会权利有关。例如,分析移民身份对卫生服务获得和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这种影响折射出医疗保障社会政策对移民的包容程度,或者说移民对于医疗保障社会权利的获取水平;分别考察中国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健康和教育,这也属于社会权利的范围。上述论文以移民为对象,明确地或隐含地讨论社会权利及其实现,从而使得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有了迁移视角的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味道。移民社会权利的改善受到政策环境的约束,但个体的抗争和进取也有积极的作用。关于拉美裔移民高等教育获得的定性访谈研究提供了这样的案例。另外,这些论文作者都注意到移民社会权利的不足或缺失,并呼吁政府和社会的改进,这是学术研究基础上的人文关怀。

社会权利实现的前提是社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因此,政府行为至关重要。美国的政府体系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更小的地方政府;中国实行中央/地方政府体制,在一些学者看来,经济分权上也有类似美国的“事实上的联邦制”。中美两国的地方政府都有很大的自主权,在移民治理方面尤为如此。移民政策无疑由中央政府制订统一规范,但需要地方政府的具体化和本地化。在流入地,地方化的移民政策对于外来人口而言,有可能是福音,有可能产生障碍,也可能出现复杂的结果。本书所有关系到移民社会权利的研究绝大多数触及了地方政策问题。综观这些研究,可以获知一个有趣的中美比较现象。按照美国学者的考察,美国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基本上是不明确和不成功的,没有有效促进移民融合。但是,州层面呈现不同的情景:尽管州政策非常不平衡,一些州采取了比较积极的移民政策。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近年来颁布了一些促进移民身份和社会融合的法案。再有,美国的一些州或城市为非许可移民提供安全庇护(防止驱逐或遣返),并提供一些社会福利。这种地方差异的格局是,相对于移民较少的州,有更多移民的州更有可能成为庇护所。而在中国,2000年以后,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明确,要推进权利均等化。但是,如本书中方作者所揭示的那样,在落实中央流动人口方针政策上,地方政府实际上打了折扣,即使政策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也没有完全达到中央的要求。这些研究还显示,中国的地方差异格局也

不同于美国：流动人口密度大的城市，社会融入的程度也偏低。中美两国的这些反差需要深入的探讨。一个可能的研究线索是：中国国内迁移的成本不可能像美国国际迁移那样外部化，但有可能“回流”到流出地。具体地说，在中国，如果流动人口不能在流入地实现社会融入，中央政府要最终承担这一后果，因此，中央政策更为明确和积极；而在美国，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或转嫁到移民流出的国家，或者由直接管理移民的地方政府承担，联邦政府相对超脱。这也折射出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的一些重要区别。

四 合作研究与相互学习

本合作项目关注迁移与社会变迁。中美两方的研究人员围绕这个主旨，于2011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预备会议，中美两国研究国内迁移的学者在会上讨论了双方感兴趣的共同研究课题，通过这次预备会议，确定了进一步交流合作的领域与具体研究问题。会后在京郊开展了实地考察。2012年12月17—19日，项目在美国纽约市召开了第一次学术交流研讨会，内容包括学术研讨和实地考察，讨论进一步具体合作内容，制订合作研究计划，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更大规模的学术交流研讨会做准备。2013年6月30日—7月5日，合作研究团队在英国牛津又一次召开了学术交流合作研讨会，并与牛津大学的项目外研究学者（来自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的中国研究中心，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的迁移政策和社会研究中心等）展开交流。作为该项目的重大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共同举办的“人口流动、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于2014年4月14—15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美两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美学者在过去两年中围绕人口流动和社会政策反复讨论，循序渐进、注重交流，在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交流对话和中美比较，这次研讨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共同开展的两国学者合作交流活动的阶段性总结，研讨会围绕两国人口流动的发展和现

状、社会政策与流动人口权益保障、流动人口的健康和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书即为在此次研讨会发言的基础上形成的项目成果。

本合作项目具有几个特点：（1）相对于一两天的大规模研讨会而言，这种讨论和交流方式更为聚焦、深入，有了实质性的交流，而不是各说各话；（2）实地考察穿插在研讨会之间，使大家有了感性认识，不再是“纸上谈兵”；（3）交流期间不仅大会讨论，也分小组和专题有针对性地对研究主题和研究论文进行深入讨论与修改，独立思考写作与集体讨论交互穿插进行，有效地利用了共同相处的宝贵时间，加深了对两国情况的了解，也为下一步研究成果的形成和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情况虽然与发达国家不同，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后发展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这种周期相对较长、来回讨论交流多次的合作交流，是以往国际合作研究和交流中较为少见的。

本项目探讨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同时也是政府政策跨国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经济全球化和通信发展导致了政府政策跨国比较研究的增长，不仅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也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早期的政策学习研究聚焦国家层面的（主要指发达国家间或从富国到穷国）知识流动，而近期研究发现了知识在不同国家和城市间流动，这样，在地理区位或发展路径上取得转变或创新。考虑到中国和美国的不同历史条件和发展水平，同时缺乏有关变化因素的深度相互理解，合作研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策学习过程，而是一次中美学者的相互学习。合作项目首先推动中美社会科学家更好地理解各方追求的应对共同问题的方式：将外来移民融入城市社会保护体系之中。我们的期待是，从中美比较研究与交流中，既要探讨一般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模式，也要考察不同观点和制度形式的变异，促进地方性知识和实践相互作用、融合，为兼顾科学性和适用性的地方政策设计和改进提供学术参考。这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更多的项目和活动来推动。本书成果就是这样的一个开端。

编者

2016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迁移流动综述	郑真真	1
共同的挑战：中美人口转变、社会分层和移民		
子女教育	贺珍怡	19
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包容与农民工权利均等化	张展新	36
比较社会权利：美国的身份与		
融合	Luis Ricardo Fraga and Bryan Wilcox	65
中国地方治理与农村流动人口的公民权		
实现问题	王春光	93
美国外来移民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医疗		
保障	Van C. Tran and Katharine Donato	116
流动人口的健康：现状与政策启示	牛建林 郑真真	156
再学习的安全空间：移民学生从高中到社区		
大学的过渡	Vivian Louie	187
相同的政策，不同的实践——北京、上海和广州流动儿童		
义务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1996—2013）	韩嘉玲	233
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历史路径与前景展望	林 宝	262
美国养老保障探索：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	Richard Sutch	283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 人口的迁移流动综述

郑真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主要是由北向南的离心型迁移和由东向西、由人口高密度地区向人口低密度地区的迁移。经过两千多年形成了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的人口地理分布格局，主要大中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也离不开人口迁移的贡献。历史上的人口迁移除了经济型迁移之外，还有政府强制性的政治性迁移（如在改朝换代后向首都周边的移民）和逃避战乱或自然灾害的迁移（葛剑雄，1991）。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在局部地区之间有几次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但最大规模的还是从农村向城市的经济型迁移流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人口迁移流动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和国家政策密切相关。中国在近年来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已经历并还将有较长一段时期的人口迁移活动。回顾和梳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前现状、判断未来趋势，也有助于我们在人口、社会、经济大背景下了解相关公共政策的演进。本文将根据现有统计数据和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背景，简要回顾中国人口在不同时期的迁移流动状况和特点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变化。

本文将首先介绍主要数据来源和参考文献，通过几个指标简要描述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变化，然后分别回顾改革开放前后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与迁移流动相关

^{*} 郑真真，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的公共政策和人口迁移流动特征，最后介绍近年来人口迁移流动的新动向。

一 主要数据来源和参考文献

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全国范围数据资料，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 and 人口普查结果。由于缺乏 1987 年以前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的统计资料，这个阶段的情况主要引自国内外学者的间接估计和分析研究结果。他们使用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中国 74 城镇人口迁移调查”和“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

1987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主持、全国 16 所人口研究单位合作开展的“中国 74 城镇人口迁移调查”，是中国首次全国范围有关人口迁移的调查。该调查在 16 省市的 74 城镇开展，在 15 个特大城市、6 个大城市、12 个中等城市、10 个小城市、31 个镇选点抽样，调查了 23895 个家庭户和 1643 个集体户，调查人口 10 万人。该调查收集了 1949 年以来这些城镇的人口迁移情况和迁移人口的个人信息，调查结果对中国城镇有代表性（马侠、王维志，1988）。1988 年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是中国首次以生育节育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抽样调查，调查样本 215 万人，抽样比为 1.982‰，也称为千分之二生育调查。由于该调查覆盖城乡，样本点分布在 95% 的县市，对全国和省级都有较好的代表性（李宏规，1991）。该调查内容包括受调查者的出生地和跨省迁移相关信息，成为研究 1988 年以前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重要数据来源（Liang and White, 1996；段成荣，2001）。

1987 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中包括了人口迁移的信息，如 1987 年、1995 年和 2005 年的 1% 人口抽样调查，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不仅国家统计和人口普查都包括了迁移流动信息，也有更多专项抽样调查，为人口流动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

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情况,尽管不同学者使用不同分析方法和不同数据来源,但是研究结果在不同时期的人口迁移变化方面相当一致。本文主要参考了田方和林发棠(1986)、马侠(1987)、陈玉光(1988)、Liang 和 White(1996)及段成荣(2001)的研究结果。改革开放以后的人口迁移流动与此前相比更为开放自主,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达的地区差异和产业格局相关,也与城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相应数据资料的丰富和研究力量的增强,有关改革开放以后的人口迁移流动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本文更为关注人口迁移流动与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阶段的回顾主要参考了王桂新(2004, 2012, 2013)等的研究成果。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人口、经济和社会指标,主要引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资料或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2 版)和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资料。

二 60 年人口和社会经济变化概述

对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特征及其变化,需要在人口、社会、经济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才能有更为透彻的了解。本部分选择了几个人口、社会和经济指标,列出这些指标值在 1950—2010 年的变化,以供参考和对照。

表 1 列出了人口变动的主要指标。中国的人口转变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由于国家的大力投入,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新法接生、防治传染病和地方病等活动的开展以及一系列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传染性疾病、降低了孕产妇死亡和婴儿死亡。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推动计划生育和遍及全国城乡的避孕节育服务,有效促使生育率快速下降,在 10 年间从平均每对夫妇约 6 个孩子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约 2.1 个孩子),城市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则更快。不过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造成了高速人口增长,积累了巨大的人口增长惯性。

表 1 1950—2010 年中国的出生、死亡和增长水平变化 单位:‰

	1950— 1955	1955— 1960	1960— 1965	1965— 1970	1970— 1975	1975— 1980	1980— 1985	1985— 1990	1990— 1995	1995—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粗出生率	42	36	39	37	31	22	22	26	19	14	12	13
粗死亡率	22	21	21	10	8	7	7	7	7	7	6	7
婴儿死亡率	122	118	121	63	47	42	38	34	30	27	21	18
自然增长率	20.1	15.9	18.2	27.0	23.2	14.9	15.4	18.6	12.1	6.9	6.2	6.5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 2012》，<http://esa.un.org/unpd/wpp/Excel-Data/population.htm>，2013 年。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死亡率和生育率都呈平稳缓慢下降趋势，90 年代生育率跌至更替水平之下，此后长期稳定在 1.6 左右。中国人口在 21 世纪已完成转变，并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中国人口总量仍在惯性增长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即将进入劳动年龄的少年人口逐年缩小（见图 1）。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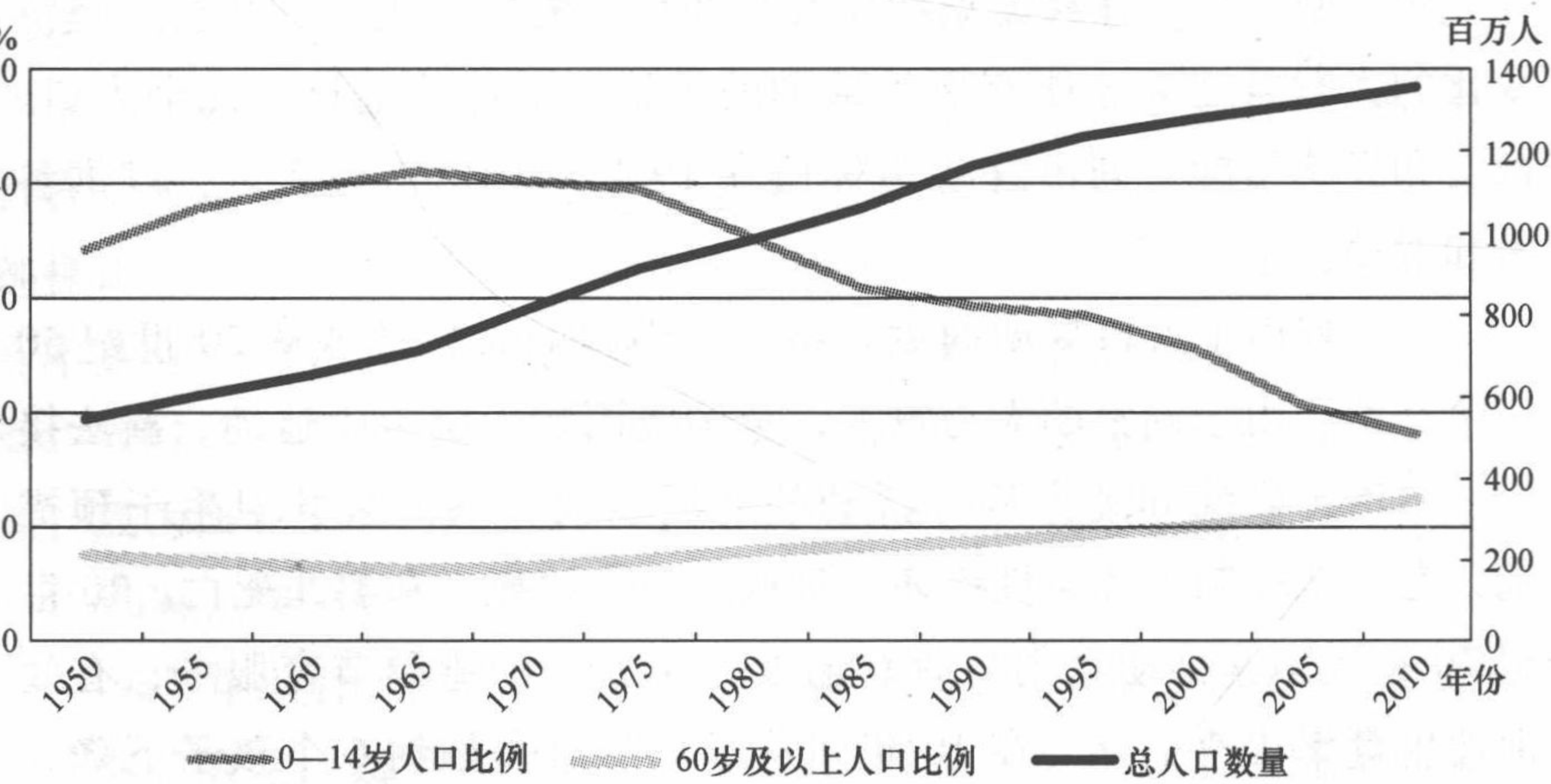


图 1 1950—2010 年中国的人口总量、0—14 岁人口比例和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同表 1。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则在前 30 年颇费周折，在后 30 年加速推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经济恢复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加速发展，形成了重工业比重偏高、工业化模式低效的基本格局，而在此后即转入调整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则陷入停滞，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得以进一步发展。图 2 用工业和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代表工业化程度，记录了这段历史时期的变化。图 2 中还列出 60 年间劳动人口中从事非农劳动比例和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非农劳动比例人口的变化与工业化大致同步，而城镇人口比重的变化则不同。人口城镇化在 50 年代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几乎与工业化同步发展。1960 年以前，由于新建厂矿和百废待兴的城市建设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民不断迁入城市以满足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需求。此后由于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人口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了 20 年，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稳步进展，近年来更是快速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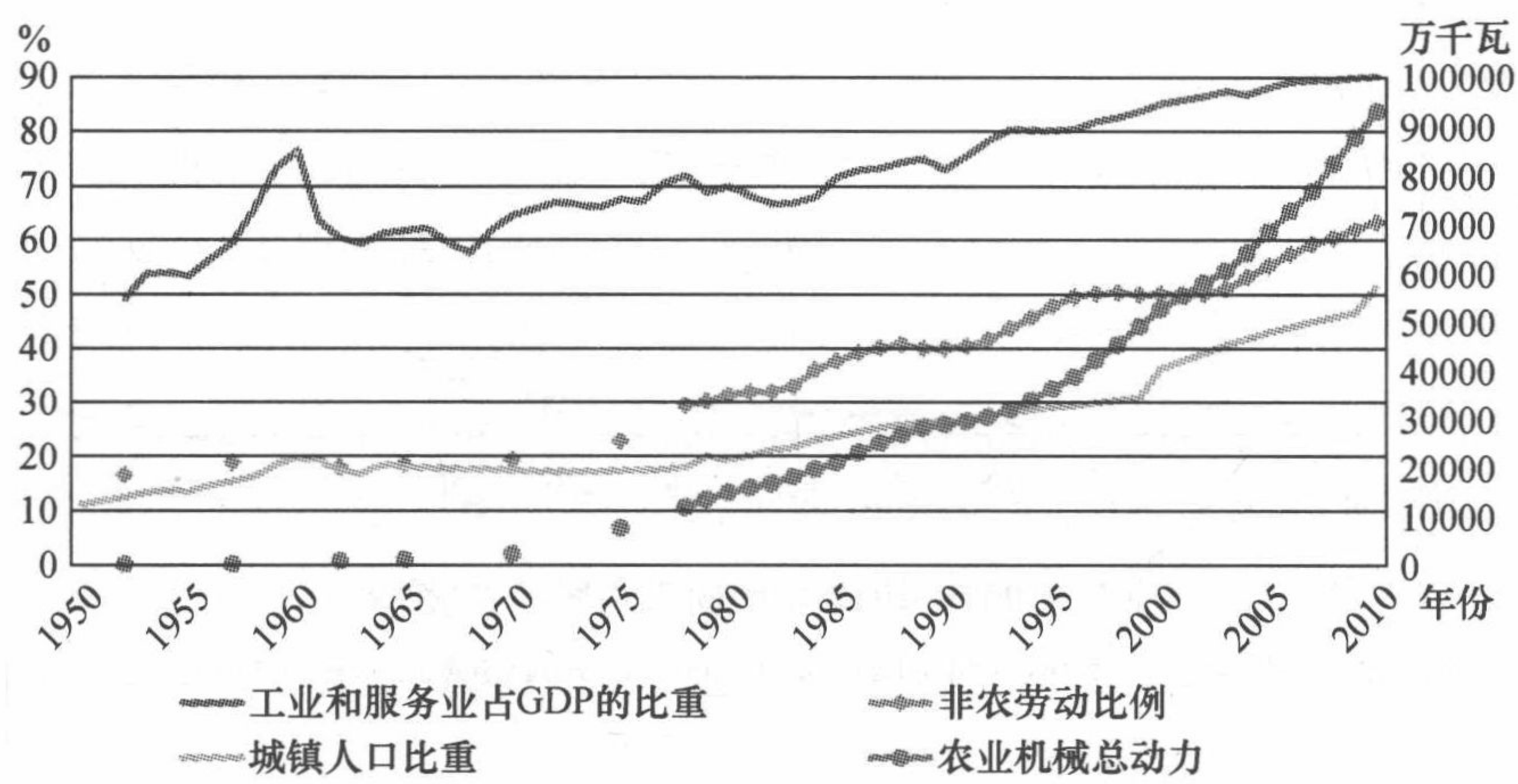


图 2 1950—2010 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则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几乎停滞，90 年代虽有增长但进展缓慢，直到 21 世纪才得以快速增长（见图 2）。改革开放初期，农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积蓄，农业问

题重点在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节约土地，保证食品供给。据统计，1978—1995 年农业机械化方面的发展主要是小型农机具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 11%，而大中型农机具增长率仅为 1%；1995—2011 年，乡城劳动力流动激增的同时，大中型农机具也高速增长，为 12.5%—13.0%，起到了节约劳动的作用，得以释放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蔡昉，2014）。

图 3 为反映经济增长的人均 GNI 数值。此外，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增长也同时惠及城乡居民的收入，1978—2011 年居民收入以年均 7.4% 的速度增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2004 年以后的两段时期，农村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市居民（蔡昉，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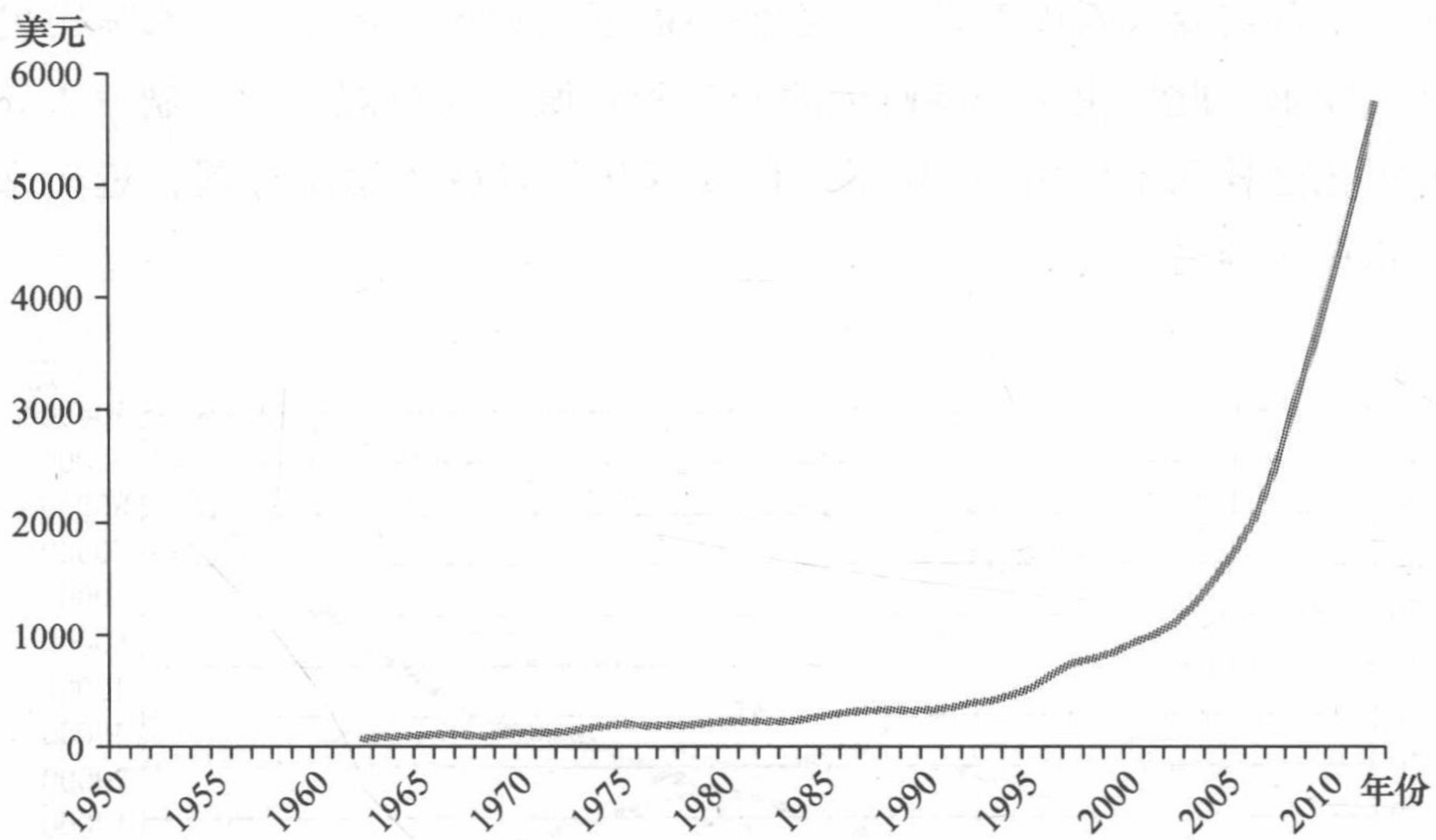


图 3 1950—2012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views/reports/tableview.aspx#>）。

三 改革开放前的人口迁移流动（1950—1977 年）

改革开放前的人口迁移流动，由于经济发展和政策等原因，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长期陷入低谷。综合考虑政治经济与相关政策的变